

#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

## 新型高校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梅 红 李 聪 朱 楠

近年来,大国博弈空前激烈,国际体系面临深度调整,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更是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各领域的震荡,这一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科学决策的难度空前加大。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国际新舞台上,如何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提升中国的全球话语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创新中国智库,都需要科学、专业、系统的研究作为决策的支撑,因此,智库的作用与价值在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愈发凸显。

当前,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智库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智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多次就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智库建设的文件,如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要求高校明确智库建设定位,聚焦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整合优质资源,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鼓励智库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等内容;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推进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初步形成。

高校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愈发显现,科学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国情、社情、民情等面临的变化与挑战,剖析当前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高校智库的改革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需要承担起人类知识生产应用的示范引领职责,担当起推动知识向人类光明方向演进的时代使命。本研究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发展,第一部分将围绕中国智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以及高校智库建设发展历程展开论述;第二部分主要围绕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特色展开;第三部分主要围绕西安交通大学智库建设成效及启发展开论述;第四部分主要围绕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路径展开。

## 一、智库发展历程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智库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智库与改革同频共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创建深圳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到建设自由贸易区,从举办奥运会到世博会、进博会,从放权让利改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从沿海沿边开放到“一带一路”建设,每一项重大改革思路、方案、政策、举措的背后,都闪烁着智库的身影,律动着智库的智慧。因此,一部改革

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智库的一部发展史,智库建设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

### 1.解放思想引领下当代中国智库的兴起

1980 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中国智库的早期版本之一,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 198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指导下,他们又连续五年(1982—1986 年)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制定,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岐山、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朱厚泽、翁永曦、黄江南等。他们都曾与杜润生一起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肩工作。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莫干山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场、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城市改革关键问题,彰显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莫干山会议为“思想碰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场景,也为后来的智库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6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的《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指出“软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次讲话首次提出要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与政策咨询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央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大量的政策分析,都由研究人员承担“智囊”“顾问”的角色,为体制改革献计献策,政策研究方法与治策思路也逐步开始有针对性地在国外引入,专家群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国智库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从国家机关和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第一批社会智库,这些社会智库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加强联系的产物。到1990年代中后期,高校智库也开始走向建制化,此前高校学者多以个体形式谋求对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获得高校的智力支持,依托高校力量建立了许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在建设中秉承“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的发展理念,践行“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认清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积极影响国家宏观决策”的发展宗旨,

为国家决策、理论创新、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作出了贡献。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加入,丰富了体制内智库研究的层次性和专业性,激发了各类观点的碰撞,也使知识分子的个体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的蓬勃兴起,彰显出中国智库体系多元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

## 3. 决策咨询体制变化下中国智库的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双重压力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这一时期决策咨询研究内容逐渐发生转向,从原先的国际关系、军事外交、宏观经济等宏大主题,更多地转向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劳动权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面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传统决策咨询体制下被动的、“短频快”式的,偏重于政策解释,缺乏前瞻性、可操作性的研究,似乎难以应对日益增长和日趋复杂的公共问题。现实压力和改革预期对决策咨询体制的组织化、规范化、法制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生存与发展,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率先思考机构转型问题,率先实现智库意识的觉醒,明确了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发展定位,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探索与实践。

全国多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这一阶段也成为各地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的高峰期。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发布决策咨询课题,聚拢决策咨询专家,为深入调研搭建平台,统率地方智库建设,从制度建设层面为确保智库专家介入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保障,有效弥补了决策者在能力、经验以及学识方面可能

存在的缺陷,广“谋”备“断”,起到了降低决策风险的作用。

#### 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将发展思想库(智库)纳入决策咨询制度化建设的范畴。同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智库在国家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智库建设的“22字”方针,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与此同时,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就包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确立了中国新型智库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路径。2015年和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分别就国家高端智库和社会智库的发展,发布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分别对国家高端智库和社会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给予了指导和规范。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也进入了公众视线。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了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多重变化,有效

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国智库以其汇聚不同领域专业化研究的协同创新能力,在影响决策、拓展公众思维及开阔眼界、提供多元化思想及研究成果等方面,愈发深刻地改变和影响民众、企业、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智库也逐渐意识到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科技、国防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形成了专业风格迥异以及专家介入方式多元的智库运行新模式。

#### (二) 高校智库形态发展历程

##### 1. 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接班人的重任,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高校的学者主要以个体的方式发挥其智囊功能。1963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共中央宣传部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审阅并批示了这份报告,随后以(中发[63]866号)文件下发各高校,要求“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根据这个文件精神1964年国家布点设立了一批实体性国别研究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东欧研究室、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与朝鲜研究所、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独立于教学院系,在隶属关系上属于国家外事部门和高校共建共管,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外交政策制定,可以说是典型的国家外交智库。时至今日,这些研究所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并以此为基础得以拓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领

域重要的智库。

## 2.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要求高校文史哲社会科学在恢复重建时,应该认真制订规划,同步恢复和重建一批研究所,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造就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自此以后中国高校的研究所重新焕发生机,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咨询服务方面成果显著。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研究基地应该“围绕体制改革、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五大任务进行建设,力争3年形成明显的优势和特色,5年使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10年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在教育部对研究基地的评估中,将研究基地的研究咨询报告被领导批示、研究报告被政府相关部门的采用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这种鼓励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服务政府决策的管理评估办法,也迅速扩散到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并进一步影响着建立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高校自身内设研究机构的科研管理机制。以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依托,高校日益重视研究基地发挥辅助决策的功能。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重视决策的专家咨询工作,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领导人对研究报告的相关批示,到国务院及各部委、各省级地方政府均逐步建立起决策咨询制度,在需求端拉动包括高校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的发展。教育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三级管理机构都重视研究基地的决

策咨询服务功能,使得高校以教育部、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有意识地探索高校智库建设。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所在高校智库建设中,大多发挥引领和整合作用。这些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活动、倡导活动和咨询活动,愈来愈趋近于现代智库的运作。研究基地均建立起官方网站,编辑政策研究内刊、要报或资政参考等智库形态的知识产品,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定期、常态化的递送。同时,研究基地逐渐增强通过媒体扩大公共宣传的力度。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为研究基地扩大其政策影响力提供了技术基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为载体的高校智库运作模式日益成熟,并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 3.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兴起

2013年4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系列批示,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中国智库迎来发展春天”的共识。各级各类高校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探索高校智库建设。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更加重视组织管理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典型特征是协同整合。

这一时期的高校智库不再是以高校下设的某个研究机构开展智库活动,而呈现典型的“高校行为”。此后高校开始举全校之力,提升以高校整体为智库品牌的影响力,比较早的实践是复旦大学成立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其他高校也先后成立智库研究院,如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的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等。2011年教育部推出“2011协同创新计划”，这一计划倡导高校间及高校与其他科研机构、软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内部政策研究机构，围绕重大战略决策开展协同研究。

高校智库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呈现对校友资源的整合运用，很多高校成立的校友会 and 校友基金会，成为高校智库的主要参与者和智库发展资金来源。高校智库的成员构成也表现出多元化。在此架构下，高校智库多采用理事会制和学术委员会制，以项目制管理研究课题，根据课题研究需要组建研究团队。高校常设的智库机构主要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课题管理和影响力的拓展。

## 二、高校智库发展特点

大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厂，以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为己任。伴随着国家治理和其他行业发展产生的各类问题的复杂性，大学越来越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行业发展的思想库。高校智库因处于大学之内，自然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是其类型智库所不具备的。这些基本特征也是高校智库的优势所在。一是高校智库具有人才储备优势。智库被视为架起知识界和政策界的桥梁，而知识界的大本营就是大学。大学集聚了各类政策研究相关的人才，在此方面是其他类型智库不可比拟的。二是高校智库具有学科、专业齐全的优势。中国的大学，大多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建设目标，学科门类齐全，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学术基础。大学学科齐全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学科的自然分化和融合交叉。国家治理面临的政策问题复杂性，越来越需要相关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这也是政策

咨询“外部化”的主要原因。三是高校智库能够把握学术前沿。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除了需要政策研究的学科交叉，更重要的是思想观点创新，学术前沿研究为思想观点创新提供营养。国际知名智库无不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其领域的佼佼者。四是高校具有丰富的社会和校友资源。高校是社会各行业人才的输出地，自然因其毕业生和各类培训而积淀下广泛的社会和校友资源，这些资源为高校智库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一）高校智库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智库最本质的特征，主要是指思想、资金以及政治上的独立。当今高校智库的独立性特征不是沿袭一般智库的特征规定性，而是发端于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即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经历了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和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两个阶段，尽管各自主张不同，但二者始终坚守“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两者的立场高度一致、始终未变，而且十分执著。

在理性主义大学理念主导下的大学，我们很难找到智库的痕迹，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催生了智库的产生。现代大学正在经历着社会化、世俗化、功利化的过程，而且开始或已经倾斜于“世俗社会”。高校智库正是在这种强调大学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中应运而生。但不论是哪种理念指导下的现代大学都没有因为理念之争放弃对“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执著坚守。于是，同样以研究为主旨的智库，独立性特征便成为其核心理念。从这一意义上说，高校智库的“独立性”特征不仅仅是一般智库操作层面的“独立性”

形式表达,更多的是在精神、理念层面的独立和坚守。

### (二)高校智库的非盈利性

从根本上说,智库是以追求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为最终的归宿。“非盈利性”指的是智库的经营运作不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这与智库的成功运作会产生利润是不冲突的。智库能在很好的经营运作下产生利润,甚至盈利,对于智库本身良性发展不无益处,智库作为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些利润维持其生存和发展。虽然智库会从事一些必要的盈利活动,有些智库甚至出现了“公司”冠名(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但智库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其独立性也要求智库对公共决策提供的研究观点和成果具有客观性,不会直接代表某个或某些利益团体。因此,智库与企业在运行模式和目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同样,高校智库的非盈利主要体现为组织上的公共性。与一般智库相比,高校智库本身的社会公益性质更为鲜明。首先,高校隶属于服务型组织,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为民众谋福祉。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其本身的社会公益性质是非常鲜明的,因此高校智库的公共性,即“非盈利性”特征可谓是一种“天性”。其次,高校智库延伸和优化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甚至可以说,高校智库本身就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彰显的最好表达形式,其在根本上依然秉承着高校的公共传统。

诚然,高校智库在坚持“独立性”和“非盈利性”的前提下,可以借鉴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合理运用市场手

段,在提供专业化服务和科学化管理的同时,赢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资源支持,进而提高自身的运作效率,不断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实力。但是,高校智库建设始终不能背离“非盈利性”这一基本特征。

### (三)高校智库的现实性

高校智库的现实性特征,是指高校智库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为现实决策服务,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思想、方案、建议和咨询等智力产品及其带来的影响和声誉,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高校智库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不会削弱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功能,而且可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获取社会对大学学术事业发展的支持。

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通常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对规律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才能在理论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因此很难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官员研究问题更关注“实然”问题,即“怎么办”“谁来办”“如何办好”等问题,考虑更多的是实效性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高校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他人,采取的是“求异”的思维方式,政府官员希望政策最终能够落实,需要各级领导、同事和群众的支持,用“求同”的思维方式。

非高校智库的研究强调现实性和可行性,为的是影响公共政策,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在“现实性”特征表达方面,高校智库似乎不如一般智库顺畅和直接,但在研究成果表达方面,高校智库却拥有一般智库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高校智库拥有丰富的基础学科资源、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相对稳定的学科

领军人物及其研究团队,这为高校智库开展政策尤其是战略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优势集中反映在时间维度的长期性特点,加之其人才队伍比较稳定,高校智库可以开展一些长期性、前瞻性的研究,形成自身的智库品牌。

#### (四)高校智库的区域性

区域性是高校智库独有的基本特征,由其所依托的高校及其地理位置决定。高校智库的研究工作基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或政治性,还与其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高度相关。高校智库也必然受到其所处区域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然而,事物的发展总带有两面性。当我们直面高校智库的“区域性”这一“先天性”制约因素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恰恰正是这一因素使得地处京城或省城之外的智库在“特色凝练”方面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机会、可能和优势。

高校智库不仅关注国家急需,更关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高校智库成员能够从地方政府获得政策制定的相关经验、组织程序等,而地方政府成员则能够从当地高校智库中习得最新理论成果。智库专家开始主动介入到政策制定中去,出现了高校智库与地方政府间相对成熟的“旋转门”机制。地方高校智库专家本身心系区域发展,具有与地方城市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这也是其他高校智库知名专家所不具备的。地方高校智库专家能深入基层,通过调查研究,找准本地区在实际发展中的问题,获得更多的地方性、区域性的信息,实现决

策的科学性。可以说,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所在地高校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资讯、人脉等“天然”优势,其“生产思想”“设计政策”“塑造和影响公众舆论”及“汇聚人才”等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可谓极致。

### 三、西安交通大学智库建设情况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新时代的智库建设需要充分借鉴吸纳西方现代智库的运作机制与有益经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立足基本职能、回应时代之问、促进学科交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路径。

近年来,学校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等文件精神,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注重“点-线-面”建设布局,依托学校优势学科,统筹相关力量,我校社科基地(智库)基本完成从外延到内涵建设的质量提升阶段,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校着力推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交大智慧。

#### (一)智库体系基本完善

学校通过各层次基地(智库)培育与布局,初步形成了从校级研究机构到



国家、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智库)的有层次、有梯队、有活力的基地(智库)体系,已建成包括国家、省部级基地(智库)30个、合作共建基地(智库)31个以及校内相关研究基地。中国智库索引(CTTI)入选单位15个,其中,“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2018年(A-)、2022年(A+)两次入选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百强智库,并位于“一带一路”领域TOP10智库首位,2019年受聘为中联部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2020年成为陕西智库联盟成员单位。在创新港建设了“管理研究院”等9个人文社科研究院(中心),设立了38个研究所,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搭建集成化跨学科平台。“十四五”规划建设“文科高等研究院”,将成为引领“一流文科”发展和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创新高地。

学校围绕“一带一路”、社会治理、区域国别、改革评估、人口迁移、法律政策、数字经济、秦创原建设等领域布局争取,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民政部、陕西省科技厅、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政府部门和高校合作共建了一批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型智库,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打造跨学科高端论坛、自贸试验区发展高端论坛、承办欧亚经济论坛智库分论坛等品牌论坛等,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等方面积极发声,为学校赢得了较好声誉。

## (二)建设成效

学校人文社科智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产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服务重大决策的能力不断提升,文科科研影响力不断提升,智库建设成果丰富。

1.新增智库52个。2021年以来,系统行为与管理实验室入选首批培育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全国21家),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培育基地“一带一路”与国际法治研究院。共计新增24个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研究基地(智库)、27个合作共建智库和1个高层次国际合作智库,占现有总数的80%以上。

2.智库建设水准大幅提高。15家机构入选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数据库;8项智库成果入选CTTI智库优秀成果;在第一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颁发的中国智库三大奖中获得“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先锋人物奖”,入围政策建言奖。资政建言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实现一等奖零的突破。我校智库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实现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零的突破,并一举获得单篇刊发4篇,其中,含由院士牵头和人文社科学院跨学科交叉合作的建言1篇。

3.策划出版系列智库报告。持续发布《欧亚经济论坛发展报告》(2013-2021)《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2-2020)《中国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报告》(2015-2019)等系列蓝皮书。

4.智库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创办智库成果转化平台《决策建言》,提交了一系列决策咨询报告获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批示或被部门文件采纳,采纳率45%以上,其中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45篇,省部级以上采纳批示应用300余篇,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服务决策能力不断提升。以智库建设为抓手,积极开展与各级政府部门间的合作,2023年,签订哲学社会科学百万级横向科研合同11项,深度参与政府、企业重大战略

和实践需求研究并建成开放式跨学科智库服务平台,推进秦创原战略研究院、物流科创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等重大合作签约,争取经费超过3600万元。

5.服务国家应急管理作用初显。面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学校多次组织智库和相关学者主动围绕战“疫”过程中的短中长期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建言献策,汇民情、聚民智、纳民意、献良策,向中央、教育部和省市各部门两次组织提交了决策建言疫情专报170余篇、汇编《疫情专报》十辑,发挥智库作用,综合研判国内和境外疫情形势与风险应对,受到《人民日报》、光明网等主流媒体报道,获得了中央、全国政协和省部相关部门的采纳应用,为研判突发事件、维护国家稳定以及前瞻性发展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 (三) 主要问题

1.智库建设投入不足。智库建设国家高度重视、社会需求也日益增长,但学校对智库建设的客观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学校省部级及以上、合作共建智库(基地)总数已达61个,数量是2015年以前的3倍还多,建设经费主要依赖社科处基本科研业务经费支持和学校智库平台建设专项经费支持,平均经费逐年下降,2017年每个智库(基地)建设经费20万元左右,近年省部级智库(基地)支持经费5—8万元左右,与兄弟院校相比投入偏低,仅够日常运行和基本支持,重大高端会议、高水平智库人才引进等工作受制于经费不足较难开展。

2.高质量智库成果不足。目前学校存在多数智库(基地)人才类型与结构单一,高校智库人才与地方政府智库、决策机关人才流通渠道不畅等问题,表

现为智库研究成果对标国家政策及重大需求不够紧密,全局性前瞻性的高水平智库成果数量还偏少,心怀“国之大者”的重大学术成果还不足,跨学科、跨部门联合的宏观战略性研究合作机制还不成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成果还有待增加。

### (四) 未来发展

1.进一步探索创新文科科研组织模式,改变过去“一张合同、一个项目”的做法。对于研究基础好,有长期合作意愿的项目实现有组织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已有研究院建设基础上,进一步依托优势学科力量,推动多家以文科为基础,以国家区域及企业发展重大战略为导向的重大合作签约落地,深度参与政府、企业重大战略和实践需求研究并建成开放式跨学科智库服务平台。

2.推进智库中心建设。推进“系统行为与管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组建工作专班,凝聚全校力量,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与人力资源部共同推进成立全校智库管理服务机构“智库中心”,为学校理、工、医、文各学科提供智库公共资源、社会联系、成果输出服务。

3.扎实推进智库建设研究。通过组织专家学者研讨会、论证会,推动产生一批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推动“科学家+工程师”的团队建设,依托学科交叉领域组建研究团队,谋划科研管理模式创新,不断扩大我校智库论坛等品牌活动的向心力、凝聚力及社会影响力。

## 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路径

### (一) 建设原则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智库是行动者的智囊,是引导行动的指引,需要直接

提供问题的解决策略。坚持问题导向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找准“真问题”并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智库的职责所在。聚焦和识别问题,必须从社会现实需求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出发,既要防范“伪问题”研究,更要避免把重大现实问题狭隘化、片面化。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智为国所用,策为民而谋。服务国家战略是智库的主体责任,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聚焦重大战略问题,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以知识服务国家、以研究参与治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坚守为民谋策。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研究立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把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和知识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把宏大历史视野和无私忘我境界有机融合在一起,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价值追求,也是优势所在。

## (二)差异化发展道路

形成自主性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熟壮大的重要标志。坚持自主性,既要自信地探索适宜于中国发展的智库建设道路,鲜明展示其特色优势,也要自觉地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聚集基本职能、履行主职主业,避免同类竞争与重复建设。服务国家战略是新型智库的鲜明特色、主体功能,国家的政治性决定了智库鲜明的政治属性。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最大特色及优势在于其为人民做学问的研究立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根本特色。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清醒地认识“研究什么”和“为谁进行研

究”两个基本问题,要在关键问题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服务于知识演进与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不能局限于各种排名,甚至失去战略方向,而热衷于碎片化的所谓“热点”问题研究。

新型智库建设的自主性还表现在要自觉地区别于其他知识生产应用机构,坚守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扬长避短,把主体功能做强做大。以研究对象为例,高校的院系专业设置基石是现代学科制度,学科建设是高校科研、育人、服务社会的基本依托。智库研究从起点就具有跨学科特征,需要交叉学科的人才储备与制度设计。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明显不足,智库建设的自主性仍较薄弱,无论是在新型智库评价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在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的规范上,都有着较大的完善空间。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更好地服务党和政府决策,应准确把握“走何道路”“借何外脑”“如何落地”“凭何发展”“以何咨鉴”五个关键问题,从坚持党管智库、增进协同创新、促进成果孵化、优化人才队伍、开放国际视野五个方面着力。

### 1. 举旗定向,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管智库,守好意识形态责任观,确保高校智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高校智库建设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新论断新要求,立足中国特色,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宣导、研究阐释,扎实做好科学研究工作。

一是坚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研究。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复杂多

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智库要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为研究主攻方向,坚持高标准定位,以增强研究能力为核心全面提升智库建设质量。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注重前瞻性研究,既着眼于党和国家当下所想所急,又着眼党和国家未来所需所谋,形成富有深刻洞见、独特见解、战略远见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

## 2. 深耕优势,形成高校智库“集群效应”

高校智库要把握自身特色,发挥校本化优势,精准有效地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一是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多学科融合。协同学校各个学校专业的优势,突破学科间的“壁垒”,将多学科智库的专业要素“汇聚一堂”,优势互补、全面合作,避免高校智库的“单向性、零散性”,更加全面地服务于决策需要。二是发挥学生优势,动员学生力量。利用高校丰富的学生资源,借助暑期社会实践、第二课堂、校园活动等,引导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做好社情民意的抓取、采编,获得一手研究素材。同时,也要以智库的研究成果为重要新闻源,扩大影响力,为决策部门的政策实施策略做好舆论引导“预热”,当好决策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三是形成“智

库矩阵”。发挥社会合力,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组建学校与民间协同、境内与境外协同、传统与现代协同的“智库联合体”,形成跨科学、跨领域、跨机构的协同创新性研究的决策信息服务模式。四是坚持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智库要办出特色,就要创新体制机制。要向管理要效益,通过善治增效益,不断完善智库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清晰的人才培养路径。要优化智库发展环境,加强政策扶持、经费支持,打通体制机制堵点,完善相关考核激励制度、成果质量管理体系等,推动形成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规律、灵活高效的管理运行体制。

## 3. 盘活“外脑”,“开门办库”提高咨政贡献

一是完善人才选拔体制。建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人才选拔是关键。要积极吸纳多领域、学科、多机构、多行业、跨区域的研究人员,组建一支结构合理、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高校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优化整合党委、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形成协同办好智库的合力。二是建立有地方特色的“旋转门”机制。智库人才应在不同岗位上充分流动、盘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智库优势。应建立智库学者在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等之间进行较为畅通流动的“旋转门”机制。让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身份转换,实现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的互补。三是要建立多元评价机制。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高校智库应紧扣智库科

研和人才工作特点,打破唯论文评价机制的壁垒,回归实际贡献本位的评价标准,充分激活智库内生动力和活力。

#### 4. 转化成果,促进决策孵化赋能

一是激活高校智库研究潜力。针对高校现有的较好研究基础、较成熟的研究课题进行“打磨再造”,使其直接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咨政建议;针对尚待深入研究,处于“中间”状态的选题,可加强智库团队与研究团队的协作,充分挖掘选题的咨政价值,推动研究进展,促进成果落地;对于尚无人研究的选题,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二是强化高校智库应急支援作用。设置智库专家应急咨询机制,智库专家需要扮演好政府“贴身”智囊的角色。遇有重大舆情或事件,充分调动专家力量,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在重大事件前进行预判,从源头上疏导和化解风险。三是发挥高校智库咨政作用。应可持续、常态化、有规律地组织智库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座谈、研讨、意见征询等,建立多轮评审、盲审反馈机制,对咨政报告进行论证、修改并完善,确保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咨政建议或行政方案,真正为政府重大政策决策提供科学建议。四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搞好调查研究作为智库的基本方法论,在实践中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既要总结好的发展经验,也要去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寻找方法,在实践中产出成果,并把成果放到实践中检验。唯有扎扎实实搞好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高质量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良策。

#### 5. 开放视野,加强国际智库比较研究

一流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海纳百川,吸纳具备不同学科和实践背景的研究者,乃至各国研究者,以实现智库人才国际化、多元化。高校国际合作频繁,国内外交流充分,高校智库除了深耕本土研究外,也是开展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完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积极拓展智库对外合作交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和政策对话,广泛宣传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智库品牌。一是充分开展国际交流。作为“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高校智库,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论坛、会议、访问学生等方式开展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力。二是设置国际性议题。主动在国际舆论上发声,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叙事,引导舆论走向,在国际平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中国话语表达的国际认同。三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利用新媒体手段,与海外高校、国际组织建立密切联系,构建“云上”交流平台。利用好中国留学人员和留居海外的华侨,对接国际话语体系,促进国际认同。

#### 作者

梅红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李聪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朱楠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文员